

文化记忆对当代藏族作家的主体性影响

顾军霞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通识教育学院 重庆 401331

摘要：文化记忆是探索历史的工具，也是人类文明的生命体验。当代藏族作家群中，大多数作家依然植根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在地域、语言、文化等差异与碰撞中，他们一方面承受着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文化体认的失落与迷茫，另一方面保持和唤醒民族的文化记忆，使那些遗落于历史边缘的记忆重新在笔下结成了民族成员彼此相连的文化记忆链。他们对本民族的神话传说、风俗信仰、情感体认、审美惯习的文化阐释，意在维护民族的共同记忆，是文本审美意蕴的延伸与文化记忆的深度契合，是对民族文化记忆传承的忧思，对民族间的文化融合与历史记忆的保存不乏启示。

关键词：文化记忆；当代藏族作家；主体性；当代藏族文学

一、当代藏族作家的文学书对文化记忆的阐释

当代藏族作家群中，无论是母语写作还是汉语创作，作家们自觉植根于民族文化丰沃的宝藏，坚守本民族的文化立场。他们以自己的书写保持和唤醒民族的文化记忆，使那些遗落于历史边缘的记忆重新在自己的笔下结成了民族成员彼此相连的文化记忆链。其中，降边嘉措、扎西达娃、阿来、央珍、梅卓、益西单增、次仁罗布、益西泽仁、达真等当代藏族作家的创作尤具代表性。在他们的创作中，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更为“深邃、丰富更具活力的民族集体无意识海面下的巨大冰川，他们用细致入微的方法和极大的耐心、勇气和毅力去钩沉、索隐，使之浮出集体无意识的海面。”^[1]

（一）传统宗教、仪式的文化积淀

藏族宗教传统并非单纯的信仰形态，而是长期嵌入社会生活与精神世界的重要文化结构。受高原自然环境、历史生存经验及群体心理积淀影响，祭祀、祈愿、驱邪等仪式逐渐转化为民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为维系族群认同与精神秩序的重要载体。在文学书写中，这类宗教仪式往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记忆。在《康巴》中，

达真将一场土司间的谈判书写得庄严肃穆。“阿旺活佛坐北朝南，僧众在他的左右一字排开，活佛闭上双眼，摇响铜铃后诵经声开始，伴随着是蟒号和钹、鼓的吹奏和敲击声，事先由益西涅巴安排好的桑烟开始飘起。”^[2]这表明，传统宗教仪式早已超出单一神灵崇拜范畴，而是沉淀为藏民族理解世界、安顿心灵、维系共同体经验的重要方式，并成为当代藏族作家建构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内容。

（二）神话、民间文化的情感依托

神话传说是藏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来源，承载着族群对于起源、英雄和自然秩序的集体想象，也构成当代藏族作家追溯民族精神谱系的重要资源。其中，格萨尔作为藏民族广泛传唱的英雄形象，不仅凝聚着民族历史记忆，也寄托着人们对力量、正义与拯救精神的认同。阿来在《格萨尔王》中这一神话任务进行了重述，通过说唱艺人晋美的流浪去找寻历史发生的轨迹，既重温了西藏的历史，又展现了藏民族的传统文化与高原特性。“那时候我还太小，嘴里念着郎卡扎，脑袋里想象的是故事中讲的一只九头怪，往日听说唱艺人讲故事，说有一只九头怪住在山间，饿了就腾到空中，把牧民和牦牛全部吞到肚里。格萨尔为拯救众生，和它应战，一箭射穿它的核心，结果了它的性命。”^[3]在这一过程中，神话不再只是久远传说的遗存，而成为连接民族情感、文化认同与文学书写的重要纽带。藏族作家对神话资源的持续开掘，本质上是在唤醒深层文化记忆，并赋予其当代叙事语境中的新意蕴。

基金项目：重庆社科项目“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地方性知识生产机制研究”（2021BS029），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高层次人才计划“西南地区少数民族作家地方性资源整合研究”（2022KYQD02）

作者简介：顾军霞（1981.02—），女，彝族，四川省雅安市，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及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二、文化记忆的空间拓展与文学格局的构建

(一) 文化记忆的空间建构及文化认同

空间既是物质实体，也是社会变迁与文化记忆的承载场域。当代藏族作家大多经历了多重生活空间的转换：从藏区走向国内其他城市，再由国内走向更广阔的世界。地理空间的位移与文化空间的拓展，不仅丰富了他们的精神经验和文学视野，也加深了其对本民族文化记忆的回望与认同。他们依托藏族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建构具有纵深感的空间场域，在民族文化的现代书写中不断梳理历史、现实与认同之间的复杂关联。

1. 地理空间的位移

“各地域各民族文化精神之差异，究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之分别，这种自然环境的差异直接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并由其生活方式而影响着民族的文化精神。”当代藏族作家对青藏高原雪山、草原、河流和村寨的书写，并非停留于地域景观的展示，而是将土地、人民与历史联系起来，在空间叙述中探寻民族文化的深层根基。

这片土地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印记与精神负荷。阿来在《大地的阶梯》中写拉萨、大渡河、丹巴、小金川、马尔康以及嘉绒大地，以宗教和文化的发展轨迹串联地理空间的转换，使空间移动成为历史记忆展开的路径，也使藏族文化的传播与变迁获得了具象呈现。梅卓在《太阳部落》中则借湖泊、河流、月亮、岩洞等藏地意象，将自然景观、宗教文化与历史经验交织起来，呈现环境变迁对民族心理与生命体验的持续影响。随着民族融合和经济一体化推进，传统生活方式不断受到冲击，而作家们正是通过对地理空间位移的书写，强化了对民族文化的体认、凝望与传承。

承载了数代人记忆的地理环境，不仅是文学叙述的重要基础，也是孕育作家思想的文化土壤。当代藏族作家并未拘囿于藏区封闭的地理边界，而是在空间不断移动中拓展文学视野，使地理意象与文化认同相互塑造，进一步凸显了民族文化的感染力与延续性。

2. 文化空间的拓展

当代藏族作家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开掘，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历史场景的复现，而是将神话记忆、家族记忆与社会变迁融合进更为开阔的文化空间之中。他们以地理空间为依托，将民族的过去与现实并置书写，在延展记忆边界的同时，寻找民族文化延续与认同的内在线索。

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浓缩了近一个世纪的时空跨度，将民族神话、现实社会、历史变迁与未来

想象交织起来，展现出藏民族精神世界的复杂层次。梅卓在《太阳部落》和《月亮营地》中勾勒了藏族部落变迁的历史进程，并刻画了人性演化的轨迹：上至千户、头人以及贵族家庭，下到管家、厨娘、牧民、猎人等多样的生活样态和生命情韵，他写道“这些人性的残缺和美好，直抵到了民族文化的深层积淀，更具有传达人类或人性存在的普遍意味。”《月亮营地》中的阿·格旺自私吝啬、贪图享受，但是他又自然真实；《太阳部落》中的索白不择手段地获取利益，同时他也一心一意地维护部落的发展，并且在伊扎创办了汉文学校，这些并不完美的人物是民族生活的真实写照。阿来在《空山》中以机村为中心，将碉楼、寺庙、电站、酒吧等不同意义单元并置于同一空间之中，使有限地域获得了更强的文化穿透力，也使民族文化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显现出新的审视维度。

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媒介传播和大众文化冲击，改变了少数民族文化的表现方式与传承路径。当代藏族作家所建构的文学空间并非封闭自守，而是在与其他民族、其他地域持续接触的过程中不断展开。他们将目光投向民族生活的细部，在历史与命运的深层思索中，既保持了对本民族文化记忆的坚守，也展现出民族文化在多元语境中的开放性与独特审美经验。

(二) 作家的主体性表达与文学格局的构建

1. 藏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困境

中国是拥有55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国家。各少数民族在相对集中的聚居环境中形成了各具特点的文化传统。受全球化与现代性进程影响，经济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断变化，传统文化赖以存续的社会土壤也随之松动，藏民族传统文化的发展因此面临被弱化和消解的现实压力。

首先，是宗教。宗教作为藏民族重要的文化体系，长期参与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塑造。然而随着现代工业、科技和信息传播的发展，那些承载宗教传统的自然空间与历史建筑不断遭受破坏。在《嘉绒曾经的中心：雍忠拉顶》一文中，阿来提到雍忠拉顶寺旧有的辉煌已难再现，年轻喇嘛的生活方式和精神取向也发生了转变，这说明宗教不仅在建筑形态上受到冲击，其内在精神结构与传播方式也已发生变化。那些原本承载历史记忆的宗教文明，正在现代社会的急剧变动中面临被淡化和遗忘的风险。

其次，是语言。语言既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文化传承最直接的媒介。伴随工业化、城镇化和市场

化进程加快,各民族交往日益频繁,语言接触和融合明显增强,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使用状况逐渐由单语走向双语。20世纪90年代以后,受经济和文化交流影响,越来越多藏族青年主动学习和使用汉语,最终促使汉语在西藏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宽泛,使用的频率越来越高。语言环境的变化,一方面拓展了民族间交流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对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功能和文化延续形成了冲击。

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加深,民族文化的外在表象的轮廓首先模糊起来,继而便是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也在渐变。经济与文化的频繁往来,改变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居住格局和心理结构,也使传统文化、宗教信仰及民族认同发生调整。面对文化形态日趋模糊的现实,重视文化记忆的保存、唤醒与重建,已成为延续民族传统、维系文化连续性的重要路径。

2. 作家的主体性表达与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

当代藏族作家们浸润于丰沃的藏族文化,他们对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着血亲般的感情,他们本能地接受了母族文化的滋养,并自觉传承、发扬本民族文化。然而,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是复杂的。少数民族文学要想在文化上获得主体性,并不容易。民族文学格局的构建也不完全是对民族身份的强化,而应当从“异质同构”的定位出发,积极反映中华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内在联系。这就要求当代藏族作家们一方面积极广博地接纳、吸收异质文化,在与异质文化及情感体验的持续交换过程中,肯定其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探寻更为深层的文化诉求;另一方面尊重民族文化生态的多样性,以此来维持其身份的独特性,在与异质文化互救、互助的交流中以一种精神分析式的方式,达成良性、平等的文化交流模式。

阿来对藏族文化的亲近是发自内心的,他自觉传承着藏族文化,并积极融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氛围中,寻求不同文化的深层交融与发展。《格萨尔王》的书写中,阿来通过藏民族的活史诗格萨尔,寻找民族文化遗产的线索,并让藏族内部的各个族群取得联盟,构建了一个具有深厚底蕴的民族精神共同体;《尘埃落定》中,阿来围绕嘉绒藏区的社会变迁,讲述了嘉绒地区的土司历史,被誉为“一部藏民族的秘史”;《大地的阶梯》中,阿来梳理了嘉绒与西藏的历史渊源,找寻民族的文化记忆,等等。这一系列的作品中阿来触摸民族文化的内核,对嘉绒文化和西藏文化进行了真挚的表达和叙事。

扎西达娃的作品以强烈的现代意识去探寻西藏人民的生存历史和存在体验。他作品中的人物贯穿社会各阶

层,有梦想当女演员的少女、摩托女郎、小酒店的姑娘、旧贵族小姐,还有汽车司机、修理工人、警察以及有犯罪记录的人等等。通过这些人物,扎西达娃去探寻普通大众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骚动的香巴拉》《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是扎西达娃用民族寓言式的书写铭记藏民族的过去与未来,是对藏文化的忧患与重塑。作为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藏族文化并非隐喻意义上的族群文化,扎西达娃在作品中不断地对藏族文化进行叙述与重构,通过对族群记忆和族群历史的叙述,重建民族日常生活的合法性与平等性,探索本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结合点,寻找民族间的认同性与归属感。

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文化记忆正是在一次又一次与外来民族、外来文化的接触、碰撞、冲突的过程中,逐渐凝聚起来并日益丰富成熟的。当代藏族作家们对人的精神生态的思索与叩问已经穿透民族、地域的限制,指向了生命的雄伟与文学相融合的普遍性价值时,他们触及到的是一个更为普遍的文化语境与普世价值。他们以敏锐的视角和普世的观照化解了这个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冲击下的冲突与悲情,从微观的层面展示了文化全球化的事实和忧思。由此看来,当代藏族作家们的创作实际上言说的是民族记忆之上的人类生存寓言。

结语

人类文学的历史既是自我沉醉、自我欣赏的历史,同时又可以说是自我超越、彼此沟通和认知扩大的历史,而且越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民族就越是希望在未知的世界中寻找异样的文化经验(包括文学经验),这是一种文化的气度,也是一种民族的伟大气象。在现代性构建过程中,当代藏族作家们自觉保持了对民族文化的觉醒与拓展,他们对待本民族的文化是客观的。在文学书写中,他们既会对自己民族的劣根性进行批判,同样也会对那些压制民族发展的行为表达出忧愤与反思。他们渴望的不是文化的衰落与损毁,而是各民族之间真正的对话与交融。为此,他们持续地挖掘藏族文化的历史与记忆,把对家族、民族历史的表达与个体的诉求有机地结合起来,挖掘了人性的普遍性,民族融合的探索性。

参考文献

- [1] 丹珍草.藏族当代作家汉语创作论[J].民族出版社,2008:121.
- [2] 达真.康巴[M].四川文艺出版社,2014:70.
- [3] 尹向东.风马[M].作家出版社,2017:3.